
九世纪初连结中国与波斯湾的外销瓷： 勿里洞沉船的例证

[美] 约翰·盖伊 (John Guy) 王丽明译

〔摘 要〕公元8—9世纪亚洲商业贸易非常活跃。中国与西亚之间不仅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来，而且开辟了海路新航线。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各国不断进行双向交流。沉没于印尼海域的勿里洞阿拉伯沉船，首次以大量生动的艺术品证据，印证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湾之间活跃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

勿里洞阿拉伯沉船上出土的文物有60 000多件，其中98%是陶瓷。这些陶瓷烧造于中国各窑口，但器物上的装饰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是以伊斯兰工艺品为模板，为迎合伊斯兰市场制作的。它们得自进口的伊斯兰艺术品灵感，被复制于陶瓷上，又出口回波斯湾，完成了艺术制作上一个有趣的循环。

〔关键词〕勿里洞沉船 陶瓷 唐代 中国 波斯湾

公元8—9世纪是商业贸易史上的非凡时期。亚洲商业贸易的实践活动正是在此时蓬勃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拓展远距离贸易航线的。新近在东南亚海域发现的勿里洞 (Belitung) 沉船，以考古学上的证据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这艘沉船的沉没时间被认定为是公元825—850年间。

唐代中国极为崇尚奢侈品，朝廷和城市精英对此有着旺盛的需求。7世纪中期的中国文献中，常有中国使者沿着中亚丝绸之路长途跋涉至西亚一些大城市，如撒马尔罕 (Samarkand) 和布哈拉 (Bukhara) 的记载，他们到异域寻求奇珍异品和新技术。《西域记》(658)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Western Regions*)^[1] 对此有详细记载。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在伊拉克工作的中国纺织工、金匠、油漆匠的名字也出现在许多文献中，如油漆工樊

[1] Schafer E.,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Los Angeles, 1963, P. 273.

淑 (fan shu) 和刘洩 (liu tzu), 织布工乐隈 (yueh huan) 和吕礼 (lu li)。^[1] 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许多西业的专业技工也沿着丝绸之路迁至中国, 这从中国国内那些纯外国风格的建筑便可见一斑, 如 638 年的长安波斯景教教堂, 807 年由回鹘集团建于洛阳和太原的摩尼教寺。^[2] 其时, 精美的伊朗金属制品出口到中国, 而大量的中国瓷器则出现在中东的伊斯兰市场上。它们皆与当地的产品相互影响融合, 出现一批融有当地风格和艺术特征的产品。

当时的阿拉伯游记让我们清楚得知, 用于贸易的中亚丝绸之路不只一条, 波斯湾的商人在西印度洋上进行着广泛的远距离贸易, 现在已证实这种远距离航海可达中国的南部港口。这条距离最长的海上航线是世界海上交通史发展的基础。大规模航行尽管风高路远、危险丛生, 但却能给商业投资者和冒险家带来丰厚的财富。717 年, 一个拥有 35 名波斯商人的船队从斯里兰卡 (Sri Lanka) 出发往巨港 (Palembang), 途中绝大多数船员葬身海中,^[3] 但能安全返回的却因此获得巨额回报。9—10 世纪, 伊拉克 (Iraqi) 的巴士拉 (Basra) 和伊朗 (Iranian) 的斯拉夫 (Siraf), 便是在与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得到巨额财富。10 世纪, 斯拉夫的波斯船主 buzurg ibn shahriyar, 将航海者的故事收进 *kitab 'Aja'ib al-Hind* 一书里。书中记载印度与中国的贸易中发生的丰富多彩但令人生疑、有些夸张的故事。^[4] 这些记述有部分成为辛巴达 (Sinbad) 传说的来源。文中记载, 12 世纪优秀的波斯商人 Abu'l Qasim Ramisht, 经常驾驶着阿拉伯三角帆 (Dhows) 航行至印度和中国 (图 1)。^[5] 他的财富帐目保存在基尼扎 (Geniza) 文件里, 旧开罗 (Cairo) 福斯塔特城 (Fostat) 的犹太教堂里的基尼扎有相关记录。^[6] Ramisht 葬于麦加, 其墓志仅是“一名船主”。他因个人出资捐赠中国纺织品用作头巾以供穆斯林圣殿——麦加天房克尔白使用而为世人所铭记。这个崇高的荣誉, 不仅说明其财富之巨, 而且可见 Ramisht 在阿拉伯商人中的地位。他所捐赠的中国纺织品数量之多, 表明他很可能专为此目的在中国下了订单。

中国丝绸无疑是阿拉伯—中国贸易航线上进行流通的、价值最高的日用品。沿着这条贸易路线可达日本奈良 (Nara), 正仓院 (Shosoin) 其内保存着的纺织品, 正是奢侈品贸易的最佳例证。近几年, 中国西部及其它一些地方出土的墓葬, 陆陆续续为我们勾画了汉唐丝绸之路的景象, 使我们有充足的条件去了解第一个千年里中国丝织品的贸易情况。然

[1] Schafer E.,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Los Angeles, 1963, 第 286 页。

[2] 同上, 第 275 页。

[3]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5。

[4] Shahriyar, Buzurg Ibn, *The Book of Wonders of India*, G. S. P. Freeman - Grenville (ed.), London, 1981, P. 62.

[5] Stern, S. M., 'Ramisht of Siraf, a merchant millionair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7, P. 10 - 14.

[6] Goetein, S. D.,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Vol. 5, Berkeley, 1967 - 1988.

而,通过海路进行的奢侈品贸易却没能留下相应物证。

8世纪初,海上贸易路线的重要性已日益显现。它既是因为陆上交通困难因素的增加,也是伊斯兰世界不断增长的繁荣与自信的结果。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活跃在中国南部的各个港口,尤其是广州。当时,中国南部的政局并不稳定,官员腐败,这给停居此处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带来许多困难。^[1]中国官方文献里相关的记录非常珍贵,它们为判定涉外集团的规模与性质提供了罕有的证据。758—759年,广州越发强大的波斯和阿拉伯集团为抗议当地政府官员在贸易时的贪婪行为举行暴乱。蕃商从海路逃往东京。760年,杭州由于中国人的起义而遭到洗劫,文献记载几千名波斯和大食商人丧生于此次暴乱。^[2]直到792年,广州才再度向外国贸易者开放。

大约35年以后,即826年或略迟,一艘阿拉伯商船满载着昂贵的中国商品从广州出发,仅仅到爪哇(Java)海附近的勿里洞岛便沉没了。船体发现时很完整,有15.3米。^[3]它与《玛卡梅故事集》(*Maqamat*)里所画的阿拉伯大三角帆最相似。《玛卡梅故事集》成书于1237年,由波斯湾瓦西特镇(Wasit)的哈里里(Hariri)所编(图1)。

8世纪,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浙江地位已非比寻常,频繁进行南海贸易。此时中国朝廷也逐步意识到南海贸易的重要性,714年在广州首设市舶使管理进出口船舶。沿海港口城市杭州、宁波、泉州和广州等,都驻有主要来自马来半岛、占城、印度和西亚的外国集团。城里设立供外国商团专门居住的蕃坊,以为他们的贸易和宗教活动提供方便。正如记载泉州的文献所述,蕃坊通常设在城墙外,靠近河流,那里有他们的货栈。^[4]尽管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是当时最常见的社团,但仍有一些非穆斯林的波斯人,如西亚犹太人和景教徒。穆斯林甚至能争取到地方官职,从而使穆斯林社团得以遵从伊斯兰法,而不是中国法律。穆斯林拥有这样的特权足以证实,中国朝廷很重视与外国的贸易,也可见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的外国移民中所据有的优势。

在详尽记录9世纪中期贸易状况的文献里有勿里洞的相关记载。它出现在阿拉伯地理及描述贸易路线和商品情况的水手记录中。在地名目录里,他们罗列了沿途每个港口最令人向往的农业项目。商人苏莱曼(Sulayman)的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ar al - sin Wal - Hind*)的描述最完整,甚至述及勿里洞沉船所属类型。阿布·扎伊德·阿西拉弗氏(*Abu Zayd al - Sirafi*)著于916年的《中国与印度关系》(*Silsilat al - Tawarikh*),也将阿拉伯海与中国、印度的贸易纳入其中。

8世纪,阿拉伯语成为亚洲海上交通世界的主要语言,取代波斯语及使用更普遍的马

[1] 关于唐的这段历史见王庚武的《南海贸易: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第31卷第2辑,1958年。

[2] 同上,第80页。

[3] Flecker, M., 'A 9th - 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Vol. 29, No. 2, 2000, P. 199 - 217.

[4] 苏基朗:《宋代泉州的城市形态》,第83—108页,“宋代历史”国际研讨会,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

来语。西亚人在贸易中担任更重要角色的另一例证是，阿拔斯（Abbasid）王朝的金第纳尔（Dinar）被广泛使用，这生动反应西亚在印度洋——南中国海贸易中的地位。8世纪的唐朝文献记载阿拉伯金币在广州经常用于交换，但当时中国使用的不是精致的金属币。唐代的墓葬和出土物也可以帮助判断，阿拉伯金属币为中国精英所普遍接受，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甚至出土了前伊斯兰商人的银币。^{〔1〕}不久前，在越南中部占婆发现的金第纳尔，也揭示了它在国际贸易沿岸中所扮演的角色。^{〔2〕}

8世纪末期，中国作家贾耽在《新唐书》中提及广州至巴格达的航海路线。850年，伊本·库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hibih）用阿拉伯语写就《道里邦国志》，书中详细描述这一路线。至此，波斯湾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已被有力地确立，虽然仍存在不太稳定的因素。878年广州再度发生暴力事件，据阿布·扎伊德（Abu Zaid）所述，几千名穆斯林、犹太人、景教徒和祆教徒被杀。^{〔3〕}但著名的旅行家马苏第（Mas'udi）在《黄金草原》（*Muru al-dhahab*）中记述，大屠杀发生前“来自巴士拉（Basra）、斯拉夫、阿曼（Oman）、印度、阇婆（Zabja）（西印度尼西亚）以及三夫（Sanf）（占婆）的船队，满载着商品和货物到达中国广州。”^{〔4〕}其后，他们持续几年活跃在马来半岛的港口，记载最多的是喀拉汗（Kalah）。无论如何，中国南部存在着大量且稳定的外国移民的事实，可以通过保留至今的宗教建筑——外国穆斯林的清真寺、墓葬和墓碑得以证实，并且广州和泉州的有关文献也清楚记载那里存在着贸易社区。在泉州，还散布着印度教寺遗物。^{〔5〕}这些建筑遗物表明外国商团在这里生活了长达几个世纪。

一、勿里洞的位置

勿里洞沉船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商业背景下的贸易信息。它满载着大量贵重的中国商

〔1〕 Schafer E.,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Los Angeles, 1963, P. 257 页; Michaelson, c., *Gilded Dragon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9, P. 89;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03 年。

〔2〕 最近从越南中部的梅森谷地古代占婆领域，发现许多 10 世纪的文物，其中有源自波斯湾的蓝绿釉光陶瓷。

Glover, I., 'West Asian Sassanian - Islamic Ceramics in the Indian Ocean, South,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Man and Environment*, No. 1, 2002, P. 166.

〔3〕 罗香林：《宋代广州伊斯兰：一些零碎记载》，第 176—179 页，“历史考古与文献记载：东南亚研究”研讨会，香港，1967 年。

〔4〕 Tibbetts, G. R., *A Study of the Arabic Texts Containing Material on South - East Asi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9, P. 37.

〔5〕 中国的文献资料清楚地记载着，广州和泉州都有印度教和佛教商团，尽管泉州的考古上，仅有印度教遗迹。

Goy, J., 'Tamil Merchant Guilds and the Quanzhou Trade', 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 - 1400*, Leiden, Brill, 2001, P. 283 - 317.

品,为我们揭开公元825—850年的商业面纱,因此引起高度关注。它座落于西爪哇海的珊瑚礁附近,当地人称此地为黑石。经许可后,考古队历经1998年和1999年,在印尼海域打捞“黑石号”沉船。^[1]

这批货物无疑属于公元826年左右,这与货物中的长沙碗上所刻时间一致,它们是海外交通航线上发现最早的中国商品。此前座落于韩国海域的新安沉船上的出土物,是为世人所知的最早中国沉船货品。它们可能沉没于从中国的宁波港往日本的途中,出土的工艺品所属时间是1332年。^[2]

从上述历史背景的分析已知该沉船是阿拉伯三角帆,是有着传统的阿拉伯造船技术的木船,因此,它的发现受到高度关注。这是在阿拉伯半岛外的东南亚海域首次发现中世纪阿拉伯三角帆船体。总之,勿里洞首次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证据,证实阿拉伯文献上的有关记载。

勿里洞沉船所在的区域正是当时三佛齐王朝统治的地区。关于三佛齐国的具体范围至今仍无可靠的说法,^[3]可能当时马来海峡两岸和西爪哇已有松散的联盟,中心地在东苏门答腊(Sumatra)的巨港—占碑,以及马来半岛和巽它(Sunda)海峡的控制区。这两条通路为进入印度洋和西方提供入口。确切地说,这一水域(靠近巽它海峡的西爪哇海)正是勿里洞沉船所在的地方。

二、勿里洞沉船上的货品

勿里洞沉船就象一个最大的晚唐艺术品仓库,是迄今为止在一处发现晚唐工艺品最多的——大约有60 000件。这批货品中有大量珍奇多样的器物,包括金银器、银铅铤、漆器、铜镜及铅币。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陶瓷,它们大多器形完整,属晚唐时期的作品。这些商品的生产中心广泛分散在中南和华南,彰显了9世纪中叶商业经营的协作规模。这艘位于印度尼西亚海域的阿拉伯船只,对理解唐代工艺品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是这些占出土物98%的陶瓷,为判断这艘船的目的地和市场提供了线索。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它们正驶向波斯湾。接下来,我将重点讨论9世纪波斯湾对中国陶瓷工艺品的需求。

1、广东罐

勿里洞货品可能产生的首个关键信息是:勿里洞是海上贸易航线上可用以起航的港口

[1] 我非常感谢海底勘探公司,允许我研究并出版勿里洞沉船及出土物。

[2] 新安沉船,汉城国立博物馆。

[3] Manguin, P-Y., 'Excavations in South Sumatra, 1988-1990: New evidence for Sriwijayan Sites', I. Glover (ed.),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London, 1990;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Brussels, Hull, 1990, P. 63-73.

之一。发掘过程中，大型绿彩陶罐里的长沙碗（图2）、铅铤、中国果实种籽揭开了面纱。这些用作容器的陶罐被认定为广东陶瓷，在广东附近的珠江流域有许多窑口烧造这种陶瓷。^{〔1〕}它们是中国贸易品中出现最早的容器，已在海上贸易沿岸的许多地方被发现。建于公元820年的斯拉夫星期五清真寺的地下曾发掘出一个罐，^{〔2〕}与爪哇出土的几个同时代的罐相像，肩部直接刻在陶土上的仿阿拉伯雕刻，证实这些货品正是提供给西亚商人的。^{〔3〕}这种罐被称为“杜珊”（dusan）罐，用作日常容具，出现在印度洋贸易路线的沿岸。它们和铁画长沙碗、水罐以及白瓷一同证实泰国半岛猜也（Chaiya）附近的兰波（Laem Po），是远距离贸易的重要转运点（图5）。

2、白瓷

中东为在勿里洞发现的这类中国白瓷提供最早的市场。这是首次在同一地点发现大量白瓷，其中以白瓷盘最为独特：典型的浅层剖面、环边以及玉壁底，被统称为萨马拉（Samarra）。勿里洞出土的素面印花成套杯盘，以及大型盖罐等白瓷大概有350件左右。它们质量很高，造型优美，釉色洁白，出产的窑口至少存在三种可能。其中，经高温纯瓷烧造而成的等级最高的瓷器，因是用于出口的首个例子而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可能出自河北的邢窑和定窑。那些粗陶上着不透明釉，成色稍差的单色瓷则可能出自河南的巩县窑。^{〔4〕}但这些推断仍未经窑口研究专家的分析所证实。值得注意的是，勿里洞中的另一些绿彩瓷和釉中彩绘瓷正是以这种白瓷为胎体制作的。比较沉船中的两个含盖圆罐：一个纯白，另一个带有绿彩纹饰，可证实它们的胎质相同。

始于9世纪初，中国白瓷盘在出口地被相继仿效，这表明它们在早期伊斯兰世界中使用普遍。伊斯兰陶工以中国工艺品为模型进行制作，体现在他们既学习中国造型，又学习中国上不透明白釉的技术。最明显的例子是浅碟和盘。虽然它们被普遍认定为萨马拉类，但现在却认为这种产品最初是源自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窑口。^{〔5〕}这种技术被迅速推广，现今从拉加（Raqqā）到福斯塔城（Fostat）的早期伊斯兰遗迹中都能发现不透明白

〔1〕 这些例证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也可见冯平山博物馆：《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1985年。

〔2〕 Whitehouse, D., '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 The Earliest Finds', N. Hammond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London, 1973, P. 227-283; 也可见 Tampoe, M.,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Ceramics from Siraf (Persian Gulf), 8th to 15th centuries A. D.*, Oxford, BAR-S555, 1989.

〔3〕 Adhyatman, S., *Notes on Early Olive Green Wares Found in Indonesia*, Jakarta, 1983, Pls. 10, 13; Whitehouse, D., '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 The Earliest Finds', N. Hammond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London, 1973.

〔4〕 范冬青：《上海博物馆的早期定窑瓷》，第259—264页，载《东方》，1991年。

〔5〕 Mason, R. B., and E. J. Keall, 'The Abbasid Glazed Wares of Siraf and the Basra Connection', *Iran*, Vol. 29, 1991, P. 51-65.

瓷。^[1]

3、绿彩白釉瓷

前文已提到,勿里洞出土物中不透明的中国白釉瓷与绿彩白釉瓷的胎质显然一样,很可能都来自河南的巩县。在沉船货品中,绿彩白釉瓷是款式最丰富的一组,从小执杯到大水壶,从盖盒,到大盆、盘、瓮、罐以及具有出水口的杯子,琳琅满目。这200余件的瓷器可能是勿里洞货品中最令人震惊的。

它们作为9世纪陶瓷的最重要发现,为中国晚唐与波斯湾巴士拉的早期伊斯兰制瓷风格间存在着重要关联提供了关键信息。很可能,这些瓷器正是已失传的9世纪伊拉克绿彩瓷外表装饰的原型。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们试图用典型的中唐时期唐三彩来解释这一伊斯兰创作,但这不论从时间(它们失传得很早)或从颜色的使用上都难以令人信服。^[2]200余件富于创造力的绿彩白釉瓷的发现,为9世纪伊拉克陶工所获得的精致模型提供证据。这个点缀着大片绿彩的盘子,正是中国瓷器为早期伊斯兰陶工提供模型的有力代表(图3)。这样的造型和装饰在伊拉克至阿富汗的广大伊斯兰世界中被复制到陶器上。

以前也有少数例子能证实这些地方正是晚唐中国陶瓷的出口地,^[3]如泰国半岛猜也兰波出土的晚唐瓷碎片(图5),和日本奈良宫殿出土的碎片。

这批绿彩白釉瓷富于创新,手法大胆,和当时的许多陶瓷一样直接效法金属器具,甚至在陶土的雕造细节上也仿效金属模型。一个手柄雕成奔跑的豹、出水口刻成摩迦罗(Makara)的水罐正生动再现这一特点(图4)。这种款式在一些高级白瓷(如弗瑞尔美术馆的藏品,F1917.404)和进口伊朗金属制品中都可见到。因此,它们传达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用于出口的绿彩陶瓷在波斯湾完成了循环——这些得自进口伊朗金属制品的灵感被复制于陶瓷上,又出口回波斯湾。

艺术造型传播上的循环,也活灵活现地表现在另一个细颈龙嘴罐上,它高105cm(图7),产自7、8世纪的中国,金属原型现保存在日本奈良的法隆寺里(图6)。它极可能是以长安城内使用的伊朗产品为模型制作的。勿里洞瓷罐和法隆寺金属罐的相似是惊人的:喇叭足、足底外撇、高足、鼓腹、细长颈、喇叭口、肩部安细把。最后,二者都有龙头塞(铜器上是固定的),腹部有标志性刻划:金属罐刻带翼马纹,陶罐划菱形花纹,对此我稍后再述。

勿里洞出土物中有许多工艺品和该水罐一样,有着专门针对伊斯兰市场而设计的特点。菱形转角处的花卉和棕榈纹,作为中东前伊斯兰世界特有的设计主题,流行已久。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这样设计特点的勿里洞艺术品数量很多,除绿彩白釉瓷外,一些小盘

[1] Watson, O.,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P. 37.

福斯塔城的例子,见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 C. 1401-1921。

[2] Rawson, J., M. Tite, and M. J. Hughes, 'The Export of Tang Sansai Wares: Some Recent Research',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52, 1987-88, 1989, P. 40-61.

[3] 这些例子在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有展示。

(图8)、大盖盒(直径38.5cm)上也可见到。这种设计特点初现于波斯湾特别是巴士拉的早期伊斯兰陶器(图9)。正因为出土物上的这些非中国特点的标志性主题刻划,因此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波斯湾市场委托制作的。

绿彩纹饰含有似乎是发明于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的釉中蓝钴,但此发明地并不肯定。瓷器风格的转换和相互影响方面存有些令人迷惑的问题。人们一般认为,在瓷器外表着蓝色钴料的灵感是源于中国的进口商品。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中国陶器使用的是进口伊朗钴,使用这些外国着色剂显然是为迎合波斯湾市场,并促使中东商人定购商品。在早期的巴士拉瓷器中,菱形花卉或棕榈纹是很普遍的设计,如图9的棕色锰料盘。这种设计的来源在讨论绿彩白釉瓷时已经进行判定,在论述勿里洞青花盘时还将继续讨论(图10)。很显然这样的设计是源于伊拉克。^[1]

4、青花瓷

勿里洞另有三件重要器物——青花盘,也以不透明的白瓷为载体,点彩了釉中蓝钴,是晚唐“青花瓷”器形最完整的例子。它们在勿里洞的发现为晚唐青花瓷的出现提供首个可靠的时间。除此之外,与此相关的考古例证,只有一个不知出处的三足罐和一些发掘于扬州的青花瓷碎片。^[2]扬州—宁波地区是当时生产青花瓷最集中的地方,有部分为出口商品,其设计目的显然是为迎合中东的需求。技术分析表明,其胎体制作于河南巩县窑,材料可能就是纯度略逊的白瓷。而当时仍依赖于伊朗进口的钴,则很可能由想为家乡市场特别订制瓷器的阿拉伯商人提供。

勿里洞青花瓷的钴料直接施于白釉上,这使得加温时釉中混进一定程度的彩料,而产生一些斑纹。毫无疑问,当时中国陶工确实对控制好这种钴着色剂仍有些力不从心。直至元朝,钴再度被引入商业生产,运用于经更高温烧造的较好瓷体上,才获得了更稳定的载体基础,因此允许进行釉下彩绘。

钴的运用源自伊拉克是可信服的,就象其它一些能代表巴士拉陶工独立制作的设计元素那样,即使它是装饰在中国造型的器皿上。有一款装饰丰富、混着蓝色钴光和绿彩的碟子,昭示了艺术风格相互影响的复杂性(图11,12)。此碟在造型和纹饰上与前面论述的勿里洞盘子相似,但其放射状花卉上的钴料色彩控制和运用地很好,这表明它制作于伊拉克(图13)。

勿里洞还有其它一些陶瓷可以用来印证海上贸易交往中波斯与中国的创造性对话。出土物中的四叶型绿盘,在伊拉克南部便可找到相匹配的模型。哥本哈根戴维藏品博物馆也有一个10世纪的闪着白釉光的叶型碗(图14,15)。那种以“阿布·哈里姆作品”(the

[1] Crowe, Y., 'Early Islamic Pottery and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75—1977, P. 263—278.

[2] 关于这个三足罐的考证已有出版:

毛文奇:《早期青花瓷》,第333—336页,《东方艺术》,1977年,第三期;蒋华:《扬州出土的唐代陶瓷》,第63—66页,《文物》,1984年,第三期。

work of Abu Halim) 符号为基础的标记,正是这类器皿引人注目的身份特征。^[1] 它既有伊斯兰世界的装饰技术,又吸收了中国的造型风格,这样的作品在早期伊斯兰是艺术模板。此后,双方的对话逐渐衰微,直到 14 世纪元朝,中国瓷器的再度流通时才又达到高峰。

勿里洞的货物生动阐述了由远距离贸易刺激起来的艺术风格和造型样式的转换,它们正是中世纪最长海上贸易路线上不同文化对话的结果。^[2]

作者: 约翰·盖伊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南亚与东南亚艺术馆

译者: 王丽明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文博馆员 (泉州: 362000)

(上接第 66 页)

这些生产实践中的精华往往史料记载未有涉及。赶造战船的复原建造过程留下密集的图片、数字电视、三维模型记录及监造与航行实验日志,为进一步的专项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作者许路: 厦门海大教育培训中心 (厦门: 361005)

[1] 由 Tim Stanley 翻译, 原为 “Made by Ibn Hani”。

Folsach, K von, *Islamic Art. The David Collection*, Copenhagen, 1990。

[2] 致谢: 海底勘探公司允许我出版勿里洞的照片和其它事项。



图 1:阿拉伯大三角帆船。

船壳采用捆绑和缝合技术,装有三角帆,船壳手绘驶往印度的阿拉伯商人。1237 年,哈里里的《玛卡梅故事集》里有相应说明。



图 2:装有长沙碗的罐。

绿彩粗陶,广东省。勿里洞货品,825—850 年。(M.Flecker 摄,1999)



图 3:碟。

绿彩白釉粗陶。出产窑口不明,可能是河南省巩县窑。勿里洞货品,825—850 年。



图 4:龙嘴豹把水罐。

绿彩白釉粗陶,高 31.4 厘米。出产窑口不明,可能是河南省巩县窑。勿里洞货品,825—850 年。



图 5:出土于泰国猜也兰波的晚唐上釉陶瓷。

洛坤 (Nakhon Si Thammarat)
国立博物馆(J.Guy 摄, 1987)



图 6:水罐。

龙头盖,带翼马纹。铜上镀金和银。
高 49.8 厘米。中国,8 世纪。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奈良法隆寺藏品。



图 7:水罐。

龙头盖,刻花装饰。绿色和琥珀色相间,白釉粗陶,高 105.8 厘米。出产窑口未明,可能是河南的巩县窑。勿里洞货品,825—850 年。



图 8:刻花盘。

绿彩白釉粗陶。出产窑口未明,可能是河南的巩县窑。勿里洞货品,825—850 年。



图 9:棱形和棕榈纹盘。

直径 20.8 厘米。伊拉克巴士拉,9 世纪。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号 Cic 175-1926。



图 10:棱形和放射状花纹碟。

青花粗陶,直径 23.3 厘米。河南省巩县窑。勿里洞货品,825—850 年。



图 11:绿彩蓝钴饰碟。

直径 21 厘米。伊拉克巴士拉,9 世纪。大不列颠博物馆,馆藏号 1956-7-28。



图 12:棕榈纹盘,白釉蓝绿彩饰。

直径 37.4 厘米。伊拉克巴士拉,9 世纪。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号 C.65-1934。



图 13:釉中彩绘碟。

直径 20.8 厘米。伊拉克巴士拉,9 世纪。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号 C. 1447-1924。



图 14:叶型碗。

叶型绿彩粗陶。产窑口不明,可能是浙江省。勿里洞货品,825—850 年。



图 15:叶型碗。

白釉光饰。长 13.5 厘米。伊拉克,可能是巴士拉,9 或 10 世纪。哥本哈根戴维藏品。馆藏号 7/1970。